

姚楠〈《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弁言〉

陳佳榮、謝方兩同志在編寫本書過程中，曾將一部分初稿讓我閱讀。讀後，我深深感到他們是在努力完成一項前人沒有如此認真做過而又是當前研究東南亞史所急需的基本工作。今當全稿付梓，兩位同志不嫌譴陋，囑寫序言。我雖涉獵東南亞史有年，自問水平甚低，豈敢云序，然恐違盛意，只能略談感想，以求教於編者和專家們。

中國史籍中有關東南亞各國的史料，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但是如何利用這些史料，確是個大問題。迄今為止，世界各國學者莫不承認中國史料是研究古代東南亞史不可或缺的寶貴材料，因為儘管他們致力於實地考察，發掘文物，所獲甚多，但是系統的、大量的文字記載，卻不得不依靠中國史書。東南亞各國雖也各自有其經典歷史名著，如《琉璃宮史》、《爪哇史頌》、《列王記》、《馬來紀年》、《暹國史記》、《老撾紀年》等等，各有千秋，但其內容的可靠性則不如中國的記載。英國著名東南亞史專家霍爾教授對中國史料十分重視。他曾在一篇〈東南亞古代史研究的新趨勢〉論文中，坦率地承認：“要獲得關於東南亞原始歷史的任何知識，中國史料是不可缺少的，但這些史料使研究者遇到莫大困難。因此，最近出現對中國史料的若干研究是值得歡迎的，因為它們提供了新的知識，使舊的觀點有必要進行修改。”這裏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是外國學者承認中國史料對研究東南亞古代史極其重要；其次是外國學者使用中國史料有很大困難；再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史料使外國學者改變了對東南亞史所持的舊觀點。這就說明了儘管銘文學、考古學等越來越發展，可是中國史料卻仍有其卓越地位，能使史學工作者獲得新知識，改變舊觀點，其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使用中國史料確實非常不易，尤其是對外國學者來說，他們要精通古漢語，非下極大的功夫不可。有些漢學家所譯中國古書，難免有魯魚亥豕、錯誤欠妥之處。上面所說的霍爾教授，曾寫了一部比較完整的《東南亞史》，在西方史學界被譽

為權威著作。書中引用了不少中國史料，但譯錯的不少。還有一位美國研究東南亞史的代表人物卡迪教授，寫了兩部聞名於世的東南亞史，一部叫做《東南亞歷史發展》，一部叫做《戰後東南亞史》。這兩部書是姐妹篇。卡迪教授在寫東南亞古代史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一些中國史料，但是錯誤更多。究其原因，上述兩位東南亞史專家都不懂或不大懂漢語，所以只能轉引自別的譯本，於是就以訛傳訛了。

當然，我絕無輕視長期從事東南亞史研究的外國學者。他們在史料的收集、論證、綜合、比較、分析等方面有許多長處，為我們所不及。我只是說，他們中有些人的漢語知識較少，使用中國史料有困難。其實，正因為古漢語不易學好，中國研究東南亞史的專家們也不是個個精通古漢語的，特別是中青年學者中有不少人在閱讀古書時感到相當困難。但在我們自己國家裏，條件比較好，請教別人的機會多，解決困難也方便些。只有一個問題最不易解決，而在研究東南亞史時卻又必然會遇到。那就是歷史地名的考證問題。

對於我國周邊國家歷史地名的研究，前人做過大量工作，而且獲得很大成就。在這方面，外國學者走在我們前面。本世紀以來，我國學者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急起直追，如馮承鈞、張星烺、向達等前輩對此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這項工作遠遠沒有完成，存有疑問或待進一步考證的地名非常多。舉一個例子來說，“扶桑”這個名詞，既是植物名稱，又是地名。作為地名，舊指日本或東北亞的一個地方，但在兩百年前法國漢學家德吉涅提出美洲之說，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論。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似乎德吉涅的論點已不成立。但從本世紀六十年代起，這個老問題又被提了出來，而且迄今仍在太平洋兩岸引起了很大反響，報刊雜誌上發表了不少爭論文章。孰是孰非，仍無定論。就南海地名來說，這種例子也不少。比如“崑崙”，就有多種說法，既是山名、地名，又是古國名，也有作為古代王號、官名的，或指黑膚人種，錯綜複雜，不加詳察，就會張冠李戴。再比如說，《漢書·地理志》記載的一條海外交通路線，是研究中外關係史和東南亞

史的重要資料。其中有幾個地名，幾十年來歷經中外學者考證，迄今尚無定論，而且所考證的今地，有的差距竟不可以道里計。如“黃支”的今地，一般考證為印度東岸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但也有人考證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亞齊附近。甚至還有人把它考證在非洲東岸的，此說早經否定，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又有人重新提出，而且似乎也有種種論據。這說明一名之立，談何容易。

既然古地名的考證如此不易，人們是否就視為畏途而裹足不前呢？絕對不是。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發展，所出成果也越來越多。本世紀三十年代，馮承鈞先生編著《中國南洋交通史》時，對於元代汪大淵所著《島夷誌略》中著錄的一些地名，認為“錯訛難讀”，對於沈曾植、藤田豐八、柔克義等的註釋，則認為“不無疏舛”，因而他所肯定的南海地名中有今地可考的，不過該書著錄地名中的一小部分。但在六十年代，蘇繼庠先生卻毅然承擔起校釋全書的艱巨任務，雖經十年動亂，本人受折磨病故，但其遺著在中華書局大力支持下，終於問世。於是《島夷誌略》所載全部地名均經考釋，當然不能說凡所考證已是定論，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比藤田、柔克義等的考證，應該說是前進了一大步。此外，國內學者岑仲勉、陳序經、夏鼐、章巽、朱傑勤、韓振華等教授，海外華人學者許雲樵、陳育崧等先生，在這方面均有卓越的貢獻。中青年學者對這門學科的鑽研精神，也值得欽佩。我衷心希望他們能取得更大成就，使得西域、南海乃至全世界歷史地名的考證，能夠逐步臻於完善，為研究亞洲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提供可靠的基礎。

對於我國史書著錄的古地名，除了考釋工作外，還有個極重要的整理匯總問題。馮承鈞先生在這方面開了個頭。他所編《西域地名》一書，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出版，五十年代又經陸峻嶺同志整理增補，於一九七九年出版增訂本，對我們研究古代中外關係史很有用處。近年來，在有關部門大力倡導下，世界歷史地名的整理工作為各方所重視。本書的編寫就是具體表現之一。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

陳佳榮、謝方兩同志所編撰，以收集中國史籍上記載的南海古地名為主，加以考釋；第二部分為陸峻嶺同志編撰，以外國專著中出現的南海古地名為主，轉為漢譯，加以考釋。如此兼收並蓄，相得益彰。所以本書的出版，不僅為國內研究中外關係史和東南亞史的學者提供很大的方便，估計在國際上也將產生一定的影響。

就本書的整理和編寫方法而言，確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鑑之處。這裏，我只能略談我所知道的陳、謝兩同志的工作情況。首先，他們花了好幾年時間，博覽群書，收集大量資料，編製詳細卡片，查閱的中國古籍達數百種，其中有不少是卷帙浩繁的巨著。他們參考的中外圖書雜誌更多，凡所引證，均有出處。在編寫過程中，對於體例的擬訂和各方面提供的意見，都經仔細研究，慎重考慮，以便於使用者查檢。關於今地的註釋，他們客觀介紹當前存在的說法。對於有些尚無定論的考證，則並存諸說，以供研究工作者進一步探討。在目前情況下，看來也只有採用這樣的方法，比較合理，也比較有用，因為至少可以為讀者提供一些線索，不至於把早已有過的論點作為新見解，而在幾種論點之中，又可憑自己研究所得加以分析，作出自己的結論。如前述“崑崙”一名，書中詳盡列出各說，其實也是一篇關於南海崑崙的詳細資料。

本書優點甚多，當然還不能說是一部十全十美的工具書。比如說，它是地名的綜錄，還不是有較為詳細釋文的詞典。即使在地名的收集和考證方面，也還須不斷修訂補充，提高內容質量，使之更臻完善。同時，我還希望多出版一些類似的工具書，為研究我國周邊國家古代史提供更多資料，從而進一步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我想編者也會同意我的意見的。

姚楠

1984年2月於上海

（載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